

# 6 品牌营销 Brand Marketing

## 万洲国际首获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10月7日至11日,全球最大猪肉食品公司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有限公司分别获得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首次授予信用评级。按照三大机构的信用评级等级划分,均为投资级。

10月7日,穆迪投资者服务有限公司授予万洲国际「Baa2」发行人评级,展望稳定。

10月10日,惠誉国际评级有限公司授予万洲国际「BBB+」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及「BBB+」优先无抵押评级,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展望稳定。

10月11日,标普全球评级授予万洲国际「BBB」长期企业信用评级,展望稳定,同时授予该公司「cnA」大中华区信用评级体系长

期评级。此外,跟随公司所获授评级,标普还将万洲国际的全资附属公司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企业信用评级由「BB」提升至「BBB-」,展望稳定。

穆迪副总裁兼高级信用分析师蔡慧表示,万洲国际获「Baa2」评级显示,其庞大的营运规模不仅包含多元化的地域分布,更覆盖生猪养殖、生鲜猪肉和肉制品加工全产业链,有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增长并且维持稳健的财务状况。评级亦彰显万洲国际突出的信贷能力、旗下双汇发展和史密斯菲尔德自2016年起派息的利好以及资产负债表2013年以来持续去杠杆化的趋势。

惠誉表示,万洲国际的评级受到公司于中美两地的领先地位、稳定且持续增长的市

场需求、公司业务多元化的地域分布以及中美协同效应的支持。惠誉指出,万洲国际健康的财务状况亦是支撑评级的原因,尽管万洲国际在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之初杠杆水平较高,但透过强劲的自由现金流和2014年的上市,公司的杠杆比率于过去两年中显著下降。

标普在其评级报告中指出,万洲国际在中美猪肉产品行业具有市场领先地位,并且受惠于多元化地域分布和强劲的经营现金流,而评级展望稳定显示该机构认为万洲国际在未来24个月内将会继续维持其行业领导地位和资本纪律。标普亦表示,万洲国际与史密斯菲尔德的整合为公司提供了一个原材料采购和产品分销的国际平台,相信将带来更多利好。

万洲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万隆表示,国际三大机构同步给予信用评级彰显了其对公司综合实力、财务状况、发展前景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充分肯定。史密斯菲尔德的企业信用评级获上调亦进一步证明万洲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后,致力于提升其经营效率、品牌实力和财务回报的努力已见成效。作为全球最大的肉类蛋白公司之一,万洲国际将继续积极整合集团内部资源,拓展全球平台,推进向品牌消费品公司的转型。我们相信,随着不懈推进有效的经营战略,持续促进中美协同效应的发挥,并且把握行业整合带来的机遇,公司将引领可持续增长,巩固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从而为我们的投资者、雇员和社区创造长期价值。

## 至臻品质 自卸王者

### 陕汽重卡德龙 X3000 全系自卸车全国上市发布

■ 本报记者 赵健

在国内重卡市场中,自卸车一直是陕汽的重点和亮点产品。陕汽自卸车自问世以来,始终以优越的品质和高效的价值,赢得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在10月8日,陕汽重卡德龙X3000全系自卸车全国上市发布会在西安陕汽商用车产业园盛大召开,“至臻品质 自卸王者”的大会主题、新型渣土车、公路自卸车、矿用自卸车三个细分市场的代表车型以及西南版、西藏版两个区域专属车型的精彩亮相,彰显出陕汽自卸车的王者之气。

陕汽作为国内商用车的领头羊,历经数次成功转型,已发展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尤其是在军车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方面一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此次隆重推出的陕汽德龙X3000自卸车是基于市场需求变化,针对不同细分市场和客户专属打造而成的一款全新价值平台的自卸车,它承继了陕汽军车品质与冠军荣耀,以欧洲高端自卸车产品为标杆,采用平台化、模块化技术开发的全新一代平台,实现“全新平台+全新动力”整车一体化开发模式。从基础配置到产品外观,从细分工况到区域特色,全面体现高端

可靠的品质,同时更加注重其动力性、智能化、舒适性及可靠性。

德龙X3000自卸车具有高颜值、高舒适、动力性强、驾乘高效为一体,并结合区域特点,设计特色外观,根据新型渣土车、公路自卸车、矿用自卸车三个细分市场的不同细分工况进行了专项优化,同时,定制化开发出西南版、西藏版两个区域专属车型,不断为客户提供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新价值,持续引领全国自卸车市场,并在各个细分市场实现全面领先,推动自卸车行业进入强动力、高效率、智能化的新时代。

据了解,2016年1—9月份,陕汽国内民品销售突破5.2万辆,同比增长49%,市场份额提升1.5个百分点。其中牵引车销售突破3.3万辆,同比增长56%,市场份额提升1.6个百分点;自卸车销售突破1.2万辆,

同比增长37%。在重点车型方面,陕汽X30001—9月份销售1.7万辆,同比增长近6倍,其中黄金版销售突破7000辆,目标市场份额保持行业第一。在细分市场方面,港口牵引车、新型环保渣土车长期保持行业第一;快递、冷链、轿运、环卫等细分市场实现快速突破。

至臻品质,自卸王者,价值典范,领创未来。陕汽重卡德龙X3000全系自卸车的成功发布以及在全国的正式上市,陕汽重卡德龙X3000自卸车必会持续引领全国自卸车市场,为“十三五”陕汽千亿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为客户增添财富,创造更大价值,价值突破全面迎接自卸车行业升级换代热潮,引领国内自卸车行业发展新格局的同时,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贡献最大的力量。

## 盾皇食品：品质为盾,客户为皇

上海盾皇食品有限公司(简称:盾皇食品),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专业高档休闲食品企业。公司1996年成立,本着绿色、健康的理念研发生产咖啡制品、发酵饮品、巧克力制品、茶叶制品、淀粉制品、五谷粗粮饮品、果蔬制品等专业休闲食品。为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2007年“商丘市饮之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商丘饮之健)迅速上马,作为上海盾皇食品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占地150亩,注册资金1.6亿元,定位于专业化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是上海盾皇最大规模的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有大型标准化无菌生产车间18座。是国内唯一一家生产“复合酵素饮品”的企业。为确保原材料合格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定点定向收购所需原材料,并由国际先进

的加工设备组建生产线。

由于经营成绩卓著,公司所有产品均通过ISO9001—2008和HACCP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国家QS认证等有关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认证。并且相继赢得“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河南省十佳科技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省级百佳诚信示范企业”、“国家食品质量安全推荐品牌”、“河南省名牌产品”、“中国著名品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500强”等荣誉称号。盾皇和盾皇粗粮王的商标均已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取得商标权。

2011年,商丘饮之健凭着卓越的业绩迅速发展,企业二期项目扩建加工生产“复合酵素饮品”是国内率先生产该产品的企业,提升了商丘企业在省内甚至国内的形象。同年将

上海生产加工的实体企业移至河南商丘,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整个产业链的运用。

立足上海为营销窗口,盾皇食品迅速在中国与世界各地研发、生产、推广河南省与商丘市所产之农业产品,并获得世界各国之龙头企业的推崇。2010年,盾皇企业与沃尔玛、微软、德国电信、渣打银行、戴尔电脑、奔驰、麦当劳、中国国际航空等世界一线知名企业一道,全程赞助第20届世界妇女联盟高峰论坛,并于2010年世博会与世界妇女联盟高峰论坛期间发表粗粮速饮杯、粗粮棒、粗粮月饼等高科技所研发出来的健康有机食品,在世界各国妇女领导前展现出河南企业为人类健康有机食品开发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为此世界妇女联盟秘书长Mary Schnack女士与Coffeebeany大中华区总裁夏铃女士和国内

外政商领导到盾皇企业商丘生产基地参观考察。并邀请世界妇女协会联盟秘书长Mary Schnack女士为上海盾皇杯装粗粮代言。

董事长刘志广以灵敏的触角,超前的思路、稳健的驾驭能力使企业稳固立于行业发展的前沿。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按照国家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及ISO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执行,生产车间环境按照HACCP要求执行,确保产品合格率达到100%,客户满意率达到100%。公司主要经营的水果浆、果味粉、花茶浆、果粒茶、花草茶、鲜果优多、水果红茶、免滤茶包、果露香蜜等产品,以销往全国各地即食餐饮、咖啡连锁体系、星级酒店,以及大型连锁卖场。并且公司的产品出口到了我国香港、新西兰等地。

(马兰英)

【紧接 P5】

# 康巴文化研究的“六度方法”

至嘉道年间,“受川省人口膨胀与土地压力的影响,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进入当地从事垦殖与开矿”[24]。近代以来,随着西南边疆危机突发,为了解决边疆问题,清朝加强川边经营,派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力推行办学、屯垦、练兵、开矿与通商等新政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内地汉人前往,导致大量汉人迁入。据载当时“移民开垦,裹粮食出关者以万计算”[25]。其后,抗战爆发,西康建省和汉藏商贸复苏等因素,再次推动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的迁移浪潮,据周太玄《西康通志》载:“康定人口自抗战以来已年有增加。据最近调查,实已超二万。其中汉人约占十分之六七”[26]。汉藏民族间的互动,首先表现在通婚上,出于汉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人几代之后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人又把汉文化因素带入当地的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汉人不纯,藏人不藏”[27]。这种汉、藏杂糅的文化状态,大幅度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与中间性,也增添了藏彝走廊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连接性与纽带作用。

由此,石硕先生指出,历史上,大规模汉、藏互动和文化交融是近代藏彝走廊最令人瞩目的民族现象,不仅导致该区域中汉、藏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糅合、交融,也使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同时成为藏、汉民族交流互动的通道以及学者们所称的“汉藏民族走廊”[28]。可以说,汉族与走廊内少数民族尤其是藏、羌、彝等主体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持久强劲互动交融,成为该区域人文领域又一大特色,直接导致了走廊内在东西方向上呈现“东汉”、“西藏”的民族分布格局。

(三)多元汇聚的地域文化特色

元代以来,随着汉族开始深入康区。传统的康巴文化因注入了汉地文化而进行自我文化调整 and 更新,以开放的胸襟使藏文化、汉文化以及回、蒙、羌等文化在此兼容共存、交流吸纳,互为补充,形成了以崇拜神山圣水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容、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的人文精神。列宁曾说:“只要各个

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9]就康巴而言,这种联系在历史上就已形成,并长期与四川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气连枝。如尽人皆知的《康定情歌》,就是借鉴了川北汉族的“溜溜调”,并从中融入藏文化元素而形成的,康巴的“哟哟哟哟”画派,是藏族著名的画派,其在绘画技法上,汲取了汉地传统的工笔画的艺术技巧,画面精细入微,同时以青绿色为主色调;同样,康巴的藏戏也吸收了汉地的川剧、秦腔等戏种的乐器及艺术表演形式。再如,甘孜首府康定更是一个多元文化荟萃之所,在几平方公里的康定城内就集中了世界三大宗教和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寺院。在昌都芒康县盐井地区则形成基督教、藏传佛教与东巴教相互并行的和谐局面。康巴地区各民族间在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往的状态达到一种奇特的和谐与融洽[30]。这种复合性、兼容性的多元文化特色一方面体现了康巴人开放、宽宏大度的文化态度与精神气质,更凸显了康巴各民族及族群和谐共处、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人文风貌。

### 七、创新康巴文化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

具有强烈区域、人文、民族特色的康巴文化,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六度”方法也只是在研究的视角上一种突破和尝试。康巴文化研究的基础在史料,研究的突破点在方法。行文至此,本文就康巴文化的研究方法上做出如下思考。

(一)数据化是推动康巴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

康巴文化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在于对康巴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而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研究资料是提升康巴文化的关键。由于康巴地区地处酷寒之地,空气稀薄,来自康巴之外的学者进行长时段田野调查异常艰难,康巴地区所辖州县历史上多为民族地区,历史文献保存鲜少,历史上形成的藏族、彝族等民族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字、语言等障碍使用不易,这些都成为制约康

巴文化研究迈向更高平台的现实问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地域文化研究所依靠的各种材料逐渐出现了数据化倾向,史料拥有权的“唯一性”对史料获取的障碍大大降低。进入21世纪,历史研究的数据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且成为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大数据文化、互联网文化、计算史学等已经萌芽。特别是通过大数据来寻找各类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和必然性,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因此,推定康巴文化走向深度和广度,必须在康巴文献的数据化上进行新突破,使作为地方化或地域化的康巴研究将渐渐转变成真正的全球化康巴研究。

(二)专题化是康巴文化研究深入的核心

康巴文化博大精深、类型多样、加之历史悠久有很多待解之谜。传统史学下的康巴文化研究多以田野考察、历史文献的解读为主,甚至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概述性研究,尚未真正深入到康巴区域文化的内部肌理。近年来,随着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康巴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康巴文化的研究层次,但多呈现零散、碎片化的研究,缺乏有机整合。因此,康巴文化的深化研究必须要建立在专题性研究基础上,将康巴文化进行细致的专题分类后,集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行集中攻关,从而对康巴文化的专题性问题取得重要突破。

(三)贯通化是推动康巴文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资料的数据化是为深入研究康巴文化提供资料平台,专题化研究是为推动康巴文化进行精细化。在二者的基础上,要对康巴文化进行贯通化研究。所谓贯通化,就是从区域性、全国性、历史性、世界性视野对康巴文化进行总体把握,这既是研究视野的拓展,更是研究方法的拓新,只有站在更高的视野下,从历时的、空间的、人性的三维角度予以观察,才能深刻理解康巴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带来的人文的迥异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各民族在此汇聚、各文明在此互鉴,形成了以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和

谐相处、交融互鉴的生动场景。

(本文是四川省社科院理论创新课题《元代以来四川藏区移民史》阶段成果性成果。李后强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苏东来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李海敬:《康藏地区与卫藏地区历史、社会差异浅析》载《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8月。
- [2]任新建:《论康藏的历史关系》,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总第68期。
- [3]这一时期任乃强、李安宅等学者主要对康区的历史、地理、民俗、商贸、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形成了《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西康诡异录》(上述为任乃强著)及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等学术成果。
- [4]石硕、邹立波:《康藏史研究综述》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 [5]《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之一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编印。
- [6]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8月,第3期。
- [7]《神秘北纬30度上的成都远古青铜文明》,载《民族论坛》,2006年第1期。
- [8]曾义、重曠:《康巴文化历史与康巴文化简述——从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康巴历史研究谈起》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9]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23页。
- [10]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 [11]石硕:《关于认识藏彝走廊的三个角度与研究思路》,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 [12]凌立:《康巴文化产生的特殊背景》,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实现精制棉制备纤维素的规模化粉碎生产并有效集尘

## 浙江力普精棉粉碎成套生产线的研究及产业化列入科技计划

日前,2015年嵊州市科技计划立项项目名单发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粉碎技术领航者——浙江力普粉碎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精棉粉碎成套生产线的研究及产业化”项目榜上有名。这是该产品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ZL 201320555760.X)之后的又一荣誉。

被誉为“特种工业味精”的精制棉是制造醚类纤维素、硝化纤维素和醋酸纤维素的主要材料,广泛用于食品、医药、日化、塑料、电子、造纸、冶金、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但目前国内用于粉碎精制棉的流程一般都存在效率低、人工要求高、粉尘污染等问题。

作为中国纤维素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浙江力普专注、持续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系列创新开发并获成功。精棉粉碎生产线集打散、检测、粉碎、集料、除尘于一体,实现了精制棉制备纤维素的规模化生产并有效的集尘;该生产线对塑料薄膜、胶片、纤维性物料和热敏性物料均能进行超细粉碎,特别适合于绒状、絮状棉纤维及纤维素醚类产品(如精制棉、棉麻、光纤、泡沫、橡胶等)的超细粉碎,广泛适用于化工、塑料、橡胶、造纸等行业。经山东、浙江、江苏、上海、河南等地企业使用证实,比同类产品产量可提高40%、耗能降低20%左右。产量达200~350kg/h,粉碎刀片采用高强度、抗冲击、耐磨性好的进口特种耐磨材料,并可重磨使用,使用维护成本低、稳定性好。目前,该生产线与纤维素成品粉碎机、湿粉粉碎机三项产品已经在纤维素行业中广泛应用,客户涵盖国内规模前十位的纤维素醚生产企业并获得高度认可。

浙江力普咨询热线:13806745288  
13606577969  
传真:0575-83152666;  
力普网站:www.zjleap.com;  
E-mail:zjleap@163.Com

**安徽亿通投资**  
大额资金直投,重点关注高端制造业、矿产、收农业、在建工程、地产、医药能源、诚招驻地商务代表,正式录用待遇优厚。  
**18756969001仇经理**  
邮箱:18756969001@163.com

[13]石硕、郑云峰:《藏彝走廊 腹地明珠》,载《文明》,2011年第8期。

[14]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8月,第3期。

[15]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7]杨昌儒:《也谈民族文化的创新》,载《民族问题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11年第8期,第40页。

[18]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59页。

[19]“甘孜州确定2016年林业重点”,载《四川省政府网站》,2016年1月5日。

[20]凌立:《康巴文化产生的特殊背景》,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21]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22]《康区藏族的形成及多元特点》,韩国江南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科学论集,总第13集,2004年。

[23]沈仲常、李复华:《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初探》,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24]刘正刚、唐伟华:《清代移民与川西藏区开发》,《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

[25]黄树滋:《梦轩遗稿》,《开发西北》第2卷第6期,1934年。

[26]周太玄:《西康通志·工商志》(手稿)第37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原书未标注年代。

[27]石硕:《试论康区的人文特点》,载《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28]石硕、李锦、邹立波等著:《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

[30]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8月,第3期。